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王 琪

(哈尔滨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关键词: 日本;国体论;太阳神;鬼道;天皇;神国意识

中图分类号: K31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07)06-0153-04

一、引言

日本现代右翼思想总头脑、“2·26兵变”的策划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罪人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了给当时日本带来震动的《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1]。书中写道,日本“国体”规定的天皇具有多重性格;其一是“现人神”,是“无谬的神”(从不会犯错误的神)与“国民道德”的“最高典范”,同时又是国家元首与最高政治责任者。神圣定位规定天皇总是正确的,而世俗定位又决定天皇难免错误。“天皇为神”与“天皇是元首”,产生不可避免的“二元”悖论,成为日本国体的致命要害。明治宪法是钦定宪法,必须绝对服从,宪法规定的国体无可置疑,天皇权威至高无上。议论国体,质疑皇权之神圣,是作为愤世嫉俗的青年在当时对日本社会现状的批判。虽然后来作为纯粹民粹主义者的北一辉被称为日本现代史上的法西斯“魔王”,实践北一辉思想的“2·26兵变”,成为引发日本军国上台、军国主义形成的直接引媒,但是在此我们不想评价北一辉的功过是非,只是从北一辉的结论反思几个问题:当时日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国体?日本国体、天皇具备上述性格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力量驱使自称具有

世界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的最高知识阶层的人们,以世界为敌发动战争?

在日本,“国体”一词最早被当做有独特意义的词来使用,据说源于水户学派栗山潜泽著的《保建大记》(1688年)^[2]。承安二年(1172年),中国宋朝某人书信中把日本称作夷狄,清原赖业提出反驳主张。对此,后白河法皇评说道:“若非如此,则勿能对内外昭示国体。”本居宣长评价此事说:“最近栗山氏为此事极为愤慨,国家之光据说没有被那样表述,实际也是那个意思啊”(近きころ栗山氏、此事をいたくうれたみて、国のひかりをそこなふわざなりと申せるは、誠にさることぞかし)^[3]。在这句话中,国体被解释为“国家之光”,也就是国家尊严、国威之意。“国体”一词在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普及是以英国船到日本为契机,会泽正志斋出版发出国际性危机的《新论》^[4](1925年)。《新论》开篇赋予国体以“神圣(神武天皇)凭忠孝立国”的性格,该书举出“物部氏的佛教排斥适合国体,把日本诸神从属于胡神的‘本地垂迹说’和兰学者倡导的崇洋都违反国体……”在此,国体具有国威之含义。

所谓国体,《汉书·成帝纪》中提出“通达国体”,国体是指国家的状态。《汉书·王莽传》中有“以明国体”之句,国体是指国家的体面。本文中提及的国体是“根据主权或统治权的所在来区

收稿日期:2007-07-31

基金项目:2003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项目(03B118)

作者简介:王琪(1966-),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从事日语语言及文化研究。

别的国家体制”,国体论则是对国家体制的议论。

二、“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

中国传统宗教是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的本土宗教。中国传统宗教祭祀的主要对象包括天神、地祇、祖先和人鬼几大类。每一类中又包括众多的神灵。奥古斯特·昆特主张,人类精神学史经历了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的阶段。但是在日本,神学阶段之前还有一个神话阶段^{[3]67}。8世纪初完成于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通过天孙降临的神话奠定了国家和天皇的基础。中国的天命信仰跨越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则是这一阶段之前的、跨越神话阶段和神学阶段的神话。

古代日本人的生活与现代相比,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或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左右,当时的人们认为“神”支配大自然,祭祀神灵是祈祷丰收和平安,因此祭祀、祈祷神的“神事”相当发达。在自然神的祭祀信仰中,崇拜太阳神是最显著的。

对太阳神的崇拜,亚洲各国都有,但在日本,太阳神(即日神、天神)的诞生以及崇拜祭祀的方式、程度极为独特。在《古事记》^[3]神代卷中可以找出许多名字带有“日”或“日子”等字的神灵,如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速秋津日之神、天照大神(即大日灵贵、天照大日灵贵)、向日神、庭津日神等带有“日”的神灵;天津日子根命、奥津日子神、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迹迹艺命(即天孙)等带有“日子”的神。《古事记》所载前十四代天皇中,有十三位天皇的本名中出现“日子”(《日本书纪》中作“彦”),只有第二代天皇绥靖除外。如果把“日子”(hiko)的表音文字作为“比古”、“昆古”,则《古事记》里面的很多神也都是太阳神的子孙,如宇麻志阿斯河备比古迟、大屋比古、志那那比古、金山昆古、波迹夜须昆古、边津那艺佐昆古、少名昆古那、久延昆古等(《日本书纪》均作“彦”)。由此可见,神名中出现“日子(比古、昆古、彦)”的现象明显是绳文时代崇拜太阳神的残留。因此,可以确信《魏志·倭人传》所载的2、3世纪(日本的弥生时代),太阳神的崇拜是极为兴盛的。

《日本书纪》^[6]卷六载:“(倭姬命)故随大神教,其祠立于伊势国。因兴斋宫于五十铃川上,

是谓矶宫。则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处也。一云云天皇以倭姬命为御枝,贡奉于天照大神。是以倭姬命以天照大神,镇坐于矶城严疆之本而祠之。”根据《日本书纪》神代卷可知,天照大神治理高天原,统治高天原八百万神灵。倭姬命“故随”的“大神教”就是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宗教信仰礼仪,即所谓的“皇室神道”。天照大神是皇室神道中的最高神。“以天照大神,镇坐于矶城严疆之本而祠之”的倭姬命代表的无疑是“神朝廷”的“最高理念”。如果说倭比卖命(即倭姬命)是执掌祭祀大权即宗教观念上的女王,其同母兄弟大日子淤斯吕和气(即景行天皇)就是实际掌握国家政权的“国王”,即所谓的“天皇”。

由于日本文字形成于平安时代(794—1192年)初期,此前有关日本历史的记述都源于中国。《魏志·倭人传》在介绍女王卑弥呼时开篇即是“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稍后成书的范晔《后汉书·倭传》、《梁书·倭国传》、《隋书·倭国传》、《北史·倭国传》中有关倭国的记载虽然略有删改,但是大多内容相同。所不同的也只是倭国乱及卑弥呼为王的时间不同、对卑弥呼本人的名字及其祭祀信仰的称谓不同、“给饮食传辞出入”的男子人数不同等,但在认同女王卑弥呼的存在、卑弥呼会“鬼道”上是一致的。

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卑弥呼时代的日本,多在春秋二季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祷丰收和丰收后感谢日神的恩赐。这些祭祀活动主要是诵读祝词、献上粮饌、奉奠币物。据考古发掘,粮饌多为鱼介和海藻之类的“海物”即海产品,《魏志·倭人传》载,当时倭国的海产品有“鱼鰓”、“鱼鲙”等。可以想象,女王“卑弥呼”在事鬼道、祭祀日神的时候也会供奉上述海物。况且,由于日本古代的咒法盛行,“鬼道”祭祀礼仪中的巫术因素如占卜就格外受到重视。

《古事记》一书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由天皇近侍神田阿礼把奉天武天皇诏诵习的古老相传的故事复述出来,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诏谕撰录,于712年完成。该书讲述的都是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的由来。这就可以理解当时的统治者是有意识地把人们对太阳神的崇拜与对天皇的崇拜结合起来。本居宣长论及《古事记》时也指出,其中的神话是模仿中国的传

说巧妙编写的,只勉强写下中国人“认为虚诞而舍弃的事情”,由此看出其古拙中的意图性^{[3]68}。而《日本书纪》作为六国史之一,完成于奈良时代,被誉为日本最古老的钦命编撰的正史。该书是大批文人耗时多载、参照群书完成的,尽管在编写中使用了详细的编年体,但是其真实性还是有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这两部代表着日本古代历史全部的史书既然都是受天皇诏谕,为天皇服务的目的也自然不容置疑。国体论意图的朴素性由此产生。

三、“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国体论的本质

弗洛伊德曾说过:人类最初对于权威的体验来自父亲,在今后的生涯中,把对各种权威都当做父亲来体验,没有见过的神或君主,通过这种父亲体验也能成为人的内在权威。

日本人对天皇圣性的信仰,恐怕要追溯到古坟文化时代(3世纪到6世纪)。《魏志·倭人传》中记载了女王卑弥呼权力的圣性。“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解读上文可知,倭国起始也是以男子为王的,在“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之后,靠一名“事鬼道能惑众”的女子掌握统治权。根据史书记载,卑弥呼在位至99岁。这是仅凭对武力的恐惧不足以建立秩序、唯有对圣性的敬畏才能建立秩序的典型例证。

对卑弥呼的圣性认识还体现在:“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权力者是被包裹着“禁忌”的存在,关于圣者的隐身,中国的皇帝宫殿被称为“禁中”、“禁里”,其大门被称作“禁阙”、“禁门”就是证明。日本的朝廷也继承了这些用语。这是以距离、神秘昭示高贵、不可替代、唯一性,进而达到统

治思想、灵魂的目的。这种对圣性的崇拜不是完结于卑弥呼之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依次传代,直到天皇产生。这种圣性崇拜源自太阳神崇拜,又演化成对神道的崇拜,最后将这种神道教中虚无的神转化为看得见的“人”。这为天皇神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在儒学多种道德纲目中有目的地提取“忠孝”这种服从的道德纲目作为统治者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基础提供了前提。

前面提到《日本书纪》中“由于确立了天照大御神为日本的‘皇祖神’,又认定了日本皇谱的‘万世一系’,‘神道’便成为自日本开国以来所确立的纯粹的日本传统,它代表着日本国家和个人的理想的存在形态,是这个国家的整个国家精神的最高理念”^[7]。

四、“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国体论的膨胀

《后汉书》中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使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向光武帝朝贡的“倭(音译)”国,在后汉时被赋予“奴”这个汉字。5世纪,倭王珍等受南朝的宋国皇帝封,得“安东将军倭国王”称号,这个倭国到推古朝时,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主张。

此倭王无疑指的是推古天皇,其阿辈鸡弥之号。《通典》卷一八五载:“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把“阿辈鸡弥”作为国号,但仅为孤证。《通志》卷一九四载:“(其王)号阿辈鸡弥、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把“阿辈鸡弥”作为王号,与相同,可足信凭。《隋书·倭国传》中记载,隋高祖开国二十六年(600),日本使者称“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华言天儿也”,即中国的“天子”之意。上述《隋书·倭国传》、《通志》卷一九四明确记载,“阿辈鸡弥”的意思就是“天子”,这是倭王的自称。《北史·倭国传》载:“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子。”其中“子”显然指的是“天子”(日子)。《隋书·倭国传》中还有一段倭王曾自称天子(即日子)的记载。607年,送隋帝国书一封,书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隋帝曰:“蛮夷之书,无礼之徒,复以勿听。”倭王自称“日出处天子”恐怕也源于此。《续日本纪》^[8]中还有把本国称为“中国”(文武三年七月),把新罗叫做“蛮夷”(大

宝元年正月)的记载。

从自称“天子”到后来“日出”“日落”之对比,是充满日本优越性意义的,将自我定义为“日之本”也是源于这种优越意识。日本的统治者就被称作“天”之“皇”,与中国的皇帝对等,或者还有高于后者之意。这种优越性表面上看只是对本国天皇的尊崇,然而在尊崇天皇的同时,这种“个人崇拜”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国家崇拜”的高度。这种国家崇拜的体现就是“神国意识”。

《神皇正统记》的开篇写道:“大日本者神国也,由天祖开基,日神长久统绪,仅吾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故此云神国”(大日本者神国なり。天祖はじめて基礎をひらき、日神ながく統を伝給ふ。我国のみ此事あり。異朝には其のたぐひなし。此故に神国と云なり)^[9]。

“神国”一词见于《日本书纪》。关于神功皇后九年,皇后起兵新罗,有关新罗王降伏的事迹中写道:“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是其国神兵。”这种神国思想到了13世纪元寇时,被冠以“神风”来证实。北畠亲房关于元寇的记载中就有“神明威现,现形伏首”之句。德川家康的御用学者林罗山在《本朝神社考》中也有“本朝为神国,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继相承,皇绪不绝,此乃我天神所授道也”(それ本朝は神国なり。神武帝、天を継ぎ極を建て以来、相継ぎ相承けて皇緒絶えず、是れ我が天神の授くる所の道なり)^{[3]45}。

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在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种优越意识的盲目性也正体现出书写古代历史的统治者寄希望于把这种神道

崇拜、天皇崇拜与国家崇拜融为一体。外在的神国思想和内在的对天皇的信仰,两者的合体就构成了国体论。

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既然宗教是一种压倒理性的权威体验,国体也可以背离常理地被信仰。“日本是具有征服别国权利的神国,天皇是显示奇迹的当代人神”之类的信仰,深深地根植于战争前全体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甚至在当今时代,这种带有侵略性、霸权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其他的变形仍然存在于某些右翼者的言行中。追寻日本民族思想意识根源,在当今也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宫崎滔天. 北一輝[G]//日本的名著 45. 東京: 中央公論, 1990: 321-365.
- [2] 栗山潜鋒. 大日本史賛載記・保健大記・中興鑑言[M]. 井上哲次郎, 上田萬年監修. 東京: 春陽社, 1936.
- [3] 青木保, 等. 日本人の自我意識[M]. 東京: 岩波書店, 1999.
- [4] 會澤正志齋. 會澤正志齋文稿[M]. 名越時正編. 東京: 国書刊行會, 2002: 3.
- [5] 日本文學事典・古事記[M]. 東京: 平凡社, 1982: 151-153.
- [6] 日本書紀(國史大系本)[M]. 東京: 皇學館大學出版社, 2004: 125.
- [7] 严绍璣. 古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G]//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87.
- [8] 宇治谷孟. 續日本紀[M]. 東京: 講談社, 1992.
- [9] 北畠亲房. 神皇正統記[M]. 山田欣雄校訂. 東京: 一穗社, 2004: 2.

Research on Roots and History of Works on Japanese Constitution

WANG 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sun-god and Shinto based on historical works in China and some recordation about Japanese ancient history in "Kojiki" and "Tales of Japa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works on Japanese Constitution. Then from the aspect of doomed Mikado and the demiurge mentalit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reason of the diversion from subject country to the one of country godliness is not the national powder or constitution but the self-deities worship, thus merging "ruler worship" and "country worship" into the form of "country worship" and "demiurge mentality". And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in the ancient Japan the constitution as a kind of country godliness is, in fact, a religion of country worship.

Key words: Japanese; works on constitution; sun-god; Shinto; Mikado; demiurge mentality

[责任编辑 张莲英]